

周而复◎著



周而复

往事回首录 之三

朝真暮伪何人辨

往事回首录 之叁

朝真暮伪何人辨

空餘舊跡郁蒼苔

一聲天下白

封笔孤本

周而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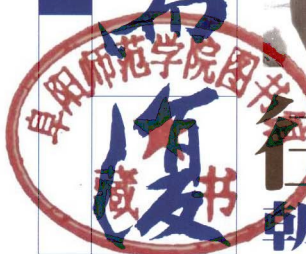


周而复◎著

往事回首录

之叁

朝真暮伪何人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回首录·3. 朝真暮伪何人辨/周而复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08-3201-X

I. 往… II. 周…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81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张: 38.5

定 价: 88.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封笔孤本

周而复

往事回首录^{之余}

朝真暮伪何人辨

周而复主要著作

上海的早晨（长篇小说四部）

白求恩大夫（长篇小说）

长城万里图（长篇小说六部）

夜行集（诗集）

燕宿崖（长篇小说）

伟人周恩来（长篇叙事诗四部）

周而复散文集（四部）

六十年文艺漫笔（文艺评论）

周而复书琵琶行（书法）

周而复书法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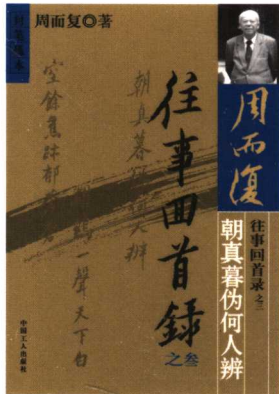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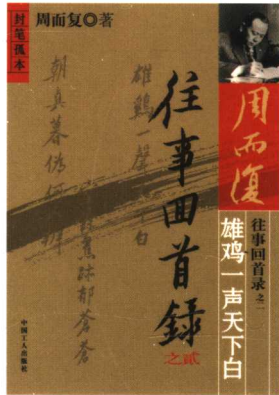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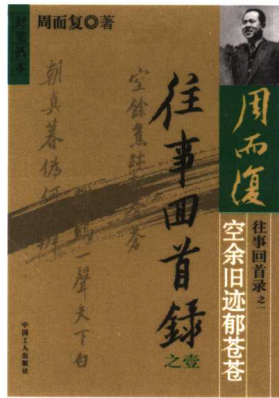
周而复文集（待出）

往事回首录（共三卷）

责任编辑：刘岚

装帧设计：

宣场 装帧设计
重洋洪刚·工作室



往事回首录
朝真暮伪何人辨

周而复
封笔孤本



1999年1月3日周而复在翠微西里寓所写作

文 芳 摄



1978年周而复在汉口和家人在一起（左起）
前排：二孙女宁宇、孙子高波、大孙女迅翔
后排：二儿媳周生、次子鲁卫、长子延抗、大儿媳张盼



往事回首录

朝真暮伪何人辨

- 一 | 荷露虽圆岂是珠 / 1
- 二 | 香花怎样变成毒草 / 15
- 三 | 《第三部》被宣判死刑 / 25
- 四 | “阶级斗争在继续” / 36
- 五 | 在风暴雨雪中 / 46
- 六 | 永夜月同孤 / 60
- 七 | 橘颂 / 70
- 八 | 《上海的早晨》的创作 / 86
- 九 | 江青迫害郭沫若 / 97
- 十 | 茅盾撕毁电影剧本 / 103
- 十一 | 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 114
- 十二 | 重灾区文化部 / 127
- 十三 | 历史的裁判 / 138
- 十四 |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巴黎 / 144
- 十五 | 在叙利亚、约旦和突尼斯 / 160
- 十六 | 《决议》和报告文学 / 172
- 十七 | 尊酒慰离颜 / 183
- 十八 | 《南京的陷落》初稿 / 203
- 十九 | 金桥友谊逾千年 / 215
- 二十 | 往来于地球月球之间 / 232
- 二十一 | 中国人、美国人的热点 / 253

二十二	巴黎，再会 / 271
二十三	欢庆新春话桑麻 / 280
二十四	千年友谊展春潮 / 287
二十五	从热带到寒带 / 294
二十六	莽莽苍苍北大荒 / 305
二十七	广播和荧屏的波折 / 313
二十八	《太平洋的拂晓》的构思 / 323
二十九	《黎明前的夜色》与结尾 / 332
三十	开创历史的新纪元 / 339
三十一	桥 / 353
三十二	巴金深情谈文学 / 359
三十三	“三无世界”的亚洲明星 / 366
三十四	参政和议政 / 376
三十五	创作《长城万里图》 / 383
三十六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空前盛会 / 404
三十七	六十年文艺漫笔 / 418
三十八	文以明道 / 422
三十九	创作长诗《伟人周恩来》 / 425
四十	访问美里周文王 / 437
四十一	朝真暮伪何人辨 / 440
附录	周而复生平 / 443
	周而复著作目录 / 447

一 荷露虽圆岂是珠

我们在介休县东湖龙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比较闭塞，看不到当天《人民日报》，要几天以后才能看到，中央电台清晨新闻广播往往没有时间听。当然，四清工作团的成员有人听，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便在公社传开了。有人听到广播发出呼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家十分惊诧，北京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惶惶然不可终日，挂念党中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以后看到《5·16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相当长的时间在农村进行“四清”工作，对《通知》前后的情况毫不了解。

《通知》要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者专政的关系。”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

真是个晴天霹雳，同时又令人坠入五里雾中，不知其中奥秘。为什么发生这么严重的偌大问题？感到突然，仔细一想，又觉得肯



定有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发展过程。我为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担忧，想分忧，却又不知道怎么做是好。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派到山西参加“四清”运动的一共有两个工作团，除了东湖龙公社一个外，还有洪山工作团，两个团的总负责人是陈忠经同志，他住在洪山。我被通知回北京，而且要第二天就走，还有一位政治工作干部和我一同回京。我惊喜参半，喜的是回到北京可以了解这个翻天覆地变化的来龙去脉，可以做点应该做的事；惊的是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去北京，其余的人继续进行“四清”运动，我带着疑问在火车上思索。

回到北京第二天，没有等我来得及了解突然剧变的情况，走进朝内大街对外文委办公大楼，“造反派”早已贴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封我为“文艺黑线人物”，武断《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是所谓“文艺黑线”的为首人物。30年代初期我和周扬同志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但很少往来。30年代末期与40年代初期，在延安，我们有往来，也不多。新中国建立后，我在上海工作10年，以后调到北京，在对外文委工作，从事政府与民间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工作，和周扬同志接触机会较少，只是在中宣部与文艺界集会上有时见面。文艺界代表会议与作家协会大会与理事会，他代表中宣部所做报告或者讲话，主要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与分析当前文艺界形势，提出方针性的意见，即使有什么不妥当的内容，可以进行学术性的讨论，怎么变成一条“文艺黑线”？又封我为“文艺黑线人物”？百思不得其解。

在对外文委，除了我以外，司马文森与丁波也被封为“文艺黑线人物”。司马文森早在30年代就发表作品，一直辛勤创作，主编《文艺生活》月刊，参加革命文艺活动。40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和他共事，对他有所了解，因其坚持革命立场进行文艺进步活动，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他先后任我驻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在对外文化交流、友好往来方面十分活跃。

丁波曾任广州市文化局长，调到对外文委后，任演出公司经理。

据我知道，他们两人和周扬往来不多，甚至参加文艺界活动很少，也列为“文艺黑线人物”，并且把批判我们三个人的大字报都张贴在一间较大的办公室里，叫做批判“文艺黑线人物”专室。

三个“文艺黑线人物”都停职反省，集中学习，每天一早上班，很晚才允许回家，由“造反派”监督和领导学习。张致祥也在这儿学习，他原是中共对外文委党组与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到对外文委接替他的工作，开展机关“四清”运动，因他执行政策有失误和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在东湖龙公社下面一个生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回到北京不久，他也被调回北京，接受批判。看来，他是老“运动员”，富有经验，学习时很少发言。摆出老实的姿态，冷静观察、窥测动向，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斗争目标是文化界，而他是党政干部，旁敲侧击地表明自己不是主要对象。

对外文委造反派在展览馆召开第一次全委干部出席的批斗大会，第一个批斗对象就是我，连出版我作品的出版社的“造反派”也前来助威，披挂上阵。事先准备好的批斗“檄文”，先后由“造反派”慷慨激昂地宣读，然后提出质问，连珠炮一般向我袭来，勒令立即回答，不准回避，不得迟疑。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外事工作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证据是：批我率领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阿根廷、巴西等国，不面向工农兵群众，却和总统代表、库比契克总统夫人以及部长们打交道，访问日本时，也是和议员以及文化界头面人物往来，很少接触群众等等。证据确凿，罪该万死！

在一片声讨中，要我立即回答。有人担心我过不了这一关，下不了台。我毫无准备，根据事实说明：出访拉丁美洲的四国和日本，当时都没有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指示：文化与外贸两者是建交的先行者。访问时尽可能接触政府、议会负责人士，多做工作，为将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辟道路，打下基础。每次出国访问计划都经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临行前，周总理或者陈毅副总理还会见出访团的负责人，指示出访事宜。执行出访计划，进行上述活动，当时看是正确的；现在看，也是正确的。



听了我的回答以后，场上许多人耸肩伸出手掌，表示失望，没有斗倒我，个别人指责我狡辩，但举不出批驳的事实，讲话也有气无力了。沉寂的形势旋即扭转，“造反派”走上台去，提出第二个问题，即作品问题。批判《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有的发言声讨者面对面批斗，指着我的鼻子，质问是谁授意我炮制这株大毒草的？要交出黑后台。我说明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亲自参与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自己想用长篇小说形式反映这一改造历程，无人指示，没有后台，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负责同志指示和历史真实写的。

会后，“造反派”头头总结经验，认为批斗会不成功，还有不少入贴出大字报，指出批斗会失败的教训在于让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回答问题，给我发言的机会，不好，今后不能让批斗对象说话，就无往而不胜了。

以后批斗会，果然不让我回答质问，只是站着、低头、恭听。

当时，对外文委在工作岗位的正副主任是：张奚若主任，副主任楚图南、李昌、宋一平、周一萍、史怀璧、李琦涛、杨纯等，陈忠经靠边。

革命“造反派”逐步形成两派，以李昌到职提拔重用的政治部门等单位组成井冈山造反派；以张致祥负责工作时期的干部组成联队。井冈山的批斗目标是张（致祥）、陈（忠经）、周（而复），而联队批斗的目标是李（昌）、宋（一平）、王（朝）。大概在当年11月前后吧，对外文委在北小街北京军区总医院召开全委大会，陈毅副总理和陈伯达、陶铸亲自出席，宣布李昌停职反省。昨天还指手画脚的领导，忽然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他提拔重用的那些大小干部不免也受到影响，当时还没有触及宋一平。不久，联队把宋一平扭送卫戍区（当然经过上面批准的）收审了。造反派两个组织，相互争雄，各有斗争对象，不得不提出一个共同的口号：打倒李、宋、张、陈、周。我从头号批斗对象，逐步降到第五位了。

两派都审讯和批斗“走资派”。井冈山设立的专案组，其中有位

成员年轻力壮，专司殴打“走资派”的职责，一见我给押到专案组办公室，就对我痛打一顿，满面流血，浑身痛楚，使用“逼、供、信”的方法，我不会撒谎以满足“造反派”设想罪行的要求，打得越发厉害。“逼”不出来，就命令滚下去。走出专案办公室，又不准我回“牛棚”，要我理好头上的乱发，擦去脸上的血迹，扑去身上的尘土，才让我走，怕被群众看到专案组成员打我了。

联队的成员举行小型批斗会，带有审讯性质，提出问题，照他们说，就是罪行，要我当场交待。我没有如他们设想的罪行，交待不出，马上伸来一只粗壮的胳膊，噼噼啪啪打了两个耳光。我只感到痛楚难以忍受，看到出席批斗会成员的视线都集中在我的脸上，感到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刚才打我的那个高个儿，又轻轻地打了我一下耳光，湿漉漉的。我以为流血了，低下头一看，流在地上的是淡淡的血水。原来他怕流血不止，特地用手浸了凉水再打我，以便止血，掩盖他的暴行。血止住了，可是疤痕留下来了。水怎么能够洗去血淋淋的暴行呢？

一度传说：“文化大革命”大约花半年时间便可结束。但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井冈山比联队人多声势大办法多，他们仿效上海“造反派”对“走资派”隔离审查的经验，在文化部二楼（对外文委和文化部在朝内大街北面一幢大楼里办公）找了两间房子，作为临时秘密“牛棚”，把李昌、张致祥、李琦涛、张映吾和我先后隔离在那儿。一间不过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放了五张床，还放了书桌，作为学习和写检查交待用的。我们五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地挤在里面，无法走动。外面有面积相等的一间，那是“造反派”监护使用的，气派完全不同，有两张沙发，一个茶几，一张办公桌和椅子等。

被打倒的干部，称为“牛鬼蛇神”，被关押的地方就叫“牛棚”。秘密牛棚是井冈山“造反派”对“走资派”专政的地方，联队的“造反派”不知道，被专政的家属也不知道，除了李琦涛例外。李琦涛在上海解放初期，就和李昌一道做青年团工作，是井冈山的保护对象，不知道什么原因井冈山也把他关进了牛棚。对他十分宽大优



待，可以在牛棚里批阅公文，还经常出去。他是在职的“走资派”。

每天刻板生活，早起、学习；三顿饭是“造反派”代买送来，怕“走资派”一到饭堂吃饭，被对立的“造反派”发现，会发生争夺“走资派”的斗争。晚饭后，允许在门外走道散步一个短时间，不准越过走道尽头那边的楼梯口。这是我们一天当中惟一能活动活动的时间。晚上开灯睡觉，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唤声划过夜空，传到秘密牛棚里，这是楼上文化部“牛棚”里传出来的，从审问当中，知道是从南京军区调来的文化部部长肖望东。解放初期，他出席华东军政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他身体瘦弱，我担心他受不了鞭笞，可是我也被关在“牛棚”里，担心又有什么用呢？

一天黄昏时分，我们散步后回到里面那间房子里，我望见“造反派”押着司马文森走了进来。他那长四方的脸庞十分憔悴，紧紧闭着嘴，望了我一眼，我也深情地望了他一眼，指了指里面房子，暗示他我们关在里面，不能交谈。他有气无力一坐到沙发里，便靠在沙发背上，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身材高大，本来是很有精力的样子，可是现在仿佛变成一摊泥掉在沙发里，大概不是刚刚被揪斗一番，就是经过严厉审讯而来的。他还带来了一床被子，井冈山“造反派”准备把他关在这座秘密“牛棚”里。可是里面那间房子别说不能再放下一张床，就是让司马文森站的地方几乎也没有，我不知道“造反派”如何安排，在外边那一间再放一张床吗？那不是有损“造反派”的“尊严”吗？同“牛”合污了吗？另外再增加一间？在我思索的时候，天渐渐暗了下来，躺在沙发上身心憔悴的司马文森忽然又给“造反派”带走了，而且行色慌张，匆匆忙忙，不知出了什么事儿。

事后知道：原来司马病危，送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去了。大概是第二天吧，他的脉搏就停止了跳动。他得了什么病？什么原因病危？送到“牛棚”以前，被批斗了？还是专案组审讯了？只有“造反派”与死者知道。死者默默走了，不能再说话了。没想到，我们在牛棚里相见一面，没有通话，竟成永诀！

关在秘密“牛棚”中的时间不太长，我们被押到对外文委下属

单位在南小街的演出公司楼下的一间大房子里。大概由于文委“造反派”都押到这间大房子里，人数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到了50多人。两派共管“牛棚”，规定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但比秘密“牛棚”有所不同，第一是由“造反派”押着到食堂吃饭，在“专政对象窗口”准许买五分钱的份菜吃；二是有病可以由“造反派”押到隆福医院去看病，每天允许走动的时间多了。在马路路上可以看到批斗×××的大标语，大字报上打了×的人名等。比被关在罐头似的“牛棚”里，可以说透了一点缝儿，约略知道外面一点情况。

五分钱的菜加主食，那热量非常不够，我的腿脚浮肿了，用手指一按就是一个肉窝。到医院看病，医生检查以后，给我开了补药，如参茸丸之类，勉强维持度日。对我的批斗会，“造反派”接受过去的经验，不再让我回答问题了，由“造反派”押赴会场，挂了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两个“造反派”分别抓着我的胳膊扭到背后，乘“喷气式飞机”，上了台上，弯腰，低头，汗水不断从额角流下，濡湿了脚前的地面，听取“造反派”批斗，锋芒主要指向《上海的早晨》。一场批斗会下来，我的胳膊被扭伤了。

第二天上午，我要求看病。两个“造反派”把我押到隆福医院。医生诊断以后，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批斗谁，我们不提意见，但不要伤害被批斗者的健康。我们站在人道立场上，向你们提意见，今后不要伤害周而复的身体。当时，医生敢于这样直率提出意见，是难能可贵的。医生开了处方，服药，敷膏药。

专场批斗我的时候少了，陪斗的时候多了。斗批李昌、张致祥、陈忠经，有时把我押赴会场陪斗，有时在“牛棚”写检讨。或者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合编的两卷集。井冈山山头到“牛棚”巡视，发现我在读这样的书，训斥一通，《毛泽东选集》够你看一辈子用一辈子了，还要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干什么？不准看！他立即把书没收，带走了。没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成了禁书。没有其他的书可读，便读毛泽东选集，其中许多文章早就读过了，从头到尾再读一篇。《实践论》、《矛盾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反复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什么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能够给我正确的答案。当然，我被列为专政对象，也不可能和别人谈这样的问题，只好放在心底……

1968年2月21日，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的时候，反动文痞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问题，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方纪同志曾经在上海出版的《收获》双月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来访者》，在文艺界有不同的反映，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可以发表文章评论，谈不到什么“包庇”。当时负责编辑的人已在《收获》发表了罗荪的评论文章，提出他的看法。姚文元对这篇小说并未评论。他在上海文艺界是根著名的棍子，经常挥舞棍子乱打一阵，钻进“文革”小组以后，更向全国挥舞了。他借批判方纪的机会，一棍子打在我头上，必欲置《上海的早晨》和作者于死地。

反革命“四人帮”一定性，他们的喉舌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紧跟。1968年8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方泽生所写的《〈上海的早晨〉鼓吹什么早晨？》，正文前面有编者按语如下：

《上海的早晨》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按照他的黑主子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炮制出来的。中国赫鲁晓夫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青年时代”，这部反动小说就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早晨”；中国赫鲁晓夫说，“剥削有功”，这部反动小说就百般美化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中国赫鲁晓夫说，工人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部小说就竭力丑化工人阶级，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一主一仆，亦步亦趋，设计出了一幅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蓝图。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很明显，有了资产阶级的“早晨”，就没有了工人阶级和